



《管子》研究

池万兴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管子》研究

池万兴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研究/池万兴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6

ISBN 7-04-014170-1

I. 管... II. 池... III. ①法家②管子-研究
IV. 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564 号

策划编辑 袁晓波 责任编辑 王 丽 封面设计 王 晔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张 颖 俞声佳
责任印制 陈伟光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82028899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2.125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0 000	定 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管仲是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在齐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使齐国很快达到霸主的地位。在先秦政治史上，罕有其匹。管仲提出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已隐含有对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初步的认识；“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是从政者应永远遵循的圭臬。这些最简要的语言揭示了最深刻的道理。管仲在世之时及死后不久，即得到当时一些著名人物如晏婴、孔丘等的高度评价（只是孔丘不赞成管仲同儒家礼仪制度不一致的做法）。但是，保存到今天的《管子》一书，情况十分复杂。《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言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并言“至其书，世多有之”。看来，今所见《管子》中一些篇章在司马迁以前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的。同时，至少司马迁以为他提到的那几篇都是管仲的著作。《牧民》为今本《管子》的首篇；《山高》即今本《形势》（篇首曰：“山高而不崩，则祁羊至矣。”是本取首二字为题，与今本不同）；《乘马》篇言制度，述建都、设官、分职、务市，及均地、立制、定赋之法，与史书所记管仲言论及所主持齐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举措相合，唯其中阑入道家鼓吹无为思想的评语一段（“无为者帝……则臣之道也。”为第二小段）；《轻重》今存十九篇篇名而亡其三，存十六篇。其中以《轻重》名者七篇，而《轻重丙》、《轻重庚》亡。所余五篇中，《轻重乙》为阴阳家言，《轻重甲》称“赵梁”，《轻重戊》称“赵氏”，显然为战国时人语。体味司马迁之语，《轻重》本其中一篇，不可能包括今日之一大类近二十篇文字；今之以

《轻重》名者，亦未必皆所见《轻重》篇文字。另司马迁提到的《九府》篇名，不见于今本，则西汉中期以前所传管仲文字，亦有散佚或窜乱。就司马迁所提到的五篇言，有篇名不同于今本者，有阑入他家思想言论者，有几次被人同他篇混同编集失其原貌者，有散佚不存者。那么，今本全书中存在的问题，可想而知。当然，《管子》一书中的问题从西汉末年已经存在。刘向在整理先秦典籍之时已谈到：“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①其所举各本中是否有窜入的他书简册，已难以断定；各书合并去其重，所取是否是比较原始的传本，去其重之后是否即没有缺失，这些都很难说。据张岱年先生的看法，《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为管仲思想的纪录，《大匡》、《中匡》、《小匡》记载了管仲的遗事，其他则大部分为战国时人所著，其中也有汉代人的附益。

然而，无论怎样，《管子》一书中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些很重要的论述，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仍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在许维遹、闻一多二位先生集校的基础上，囊括诸家研究之作，包括各种印本、抄本、稿本斟酌去取，下以己意，成《管子集校》，在很多方面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使《管子》一书文本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决。关于此书思想内容方面的研究，近年也出现了几部很有分量的专著，如胡家聪的《管子新探》、戴濬的《管子学案》等。但是，究竟如何把握书中包含的思想，如何看待这部书在今天的价值，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

池万兴同志以前对《史记》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我觉得

^① 刘向：《管子叙录》。见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8页《附录》。

这是他研究先秦诸子，尤其像《管子》这样一部复杂子书的有利条件。司马迁写《史记》中先秦部分各《本纪》、《世家》、《列传》、《表》及《书》中有关部分，参阅了大量史料，当时他读到的很多书，今天已不可能见到了。自然，他在行文之时是考虑到当时所见到的文献中的记载，斟酌虚实长短，加以论述，同我们今日据有限的材料进行推测、发挥的情形不同。同时，司马迁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多所阅闻。他在《五帝本纪》论赞中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可见，他对先秦文史的记述，在当时是抱着一个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颇费了一些探求考证的功夫的。《史记》中记载了一些民间传说，司马迁有时候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也抒发一些感慨，在材料的剪裁、篇章的安排上，也难免体现着个人的思想及情绪。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记载事实的可靠性。因此，我以为在对《史记》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后，上溯而治诸子，就具备了一种较为客观的眼光，是有其长处的。万兴同志在辞赋等方面也下过一些功夫，以此上溯、考察我国先秦时文体形成与发展的状况，也会取得他山之石的功效。所以，我建议他研究《管子》，希望能在这部书的研究上有所推进。万兴同志以一年多的时间结合明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研读《管子》一书，做了一些深入细致的工作。郭沫若当年写《管子集校》，对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采用了“一网打尽”的办法，读该书所附《〈管子集校〉所据〈管子〉宋明版本》及《〈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即可知道。尤其后一种附录，虽对有的书评其“犹承明人习气，任意删节”，或“说颇滋蔓”、“立说偏僻，不求联贯”，或以为“于义训均少发明”，但都一一过目。例如，王先谦《管子集解》一书是郭沫若先生从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中看到，他曾托杨先生查询，结果“原稿已由王氏家人售出，不知去向”。1955年9月补记：此部稿本最终打听到下落，并通过杨树达先生由中国科学院历史

研究第一所收购。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先生努力做到完全意义上的“集大成”。万兴同志一面细致研读原书，一面广泛浏览前修时贤的论著。山东淄博学院齐文化研究院主办《管子学刊》，我曾几次写信邮购创刊以来各期，都因人事变化、刊物分散不好找等原因未能办到，后来万兴请朋友从北京全部复印寄来，一一加以浏览。于此也可以看出他也希望在《管子》研究方面，能在前人及今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万兴同志在《〈管子〉研究》的撰写中，就有些问题和全书的结构等也曾和我一起讨论过。我希望他能在《管子》各篇的断代方面做出贡献，但进行中感到困难很大，所以，他先避开直接面对断代的问题，而对《管子》的版本与流传、《管子》中反映的各种思想进行了研究，尤其对后一个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他采用了数据统计与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将《管子》中与道家、法家、儒家等各家思想相同的学术术语进行统计，根据其出现频率考察与各家的关系，然后将《管子》中反映的思想分别与各家代表性著作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他对《管子》中一些作品的产生时代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当然，有些看法此前有人提出过，但他从新的角度，采用某些新的研究手段进行新的论证，其结论无论与前人同者、异者，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从本书对《管子》中包含各家思想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他开阔的思路和较深厚的理论素养。

这部书较之以往研究《管子》的论著不同的一点是作者还从文学、文体与文学性的方面对《管子》一书作了全面的探索。此前关于《管子》中文艺美学思想探索的论文，仅见到叶朗先生《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美学四篇与中国美学》的一章；关于《管子》中文学性与散文艺术的论述，虽也有几篇论文论及，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故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几种篇幅较长的先秦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总纂《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先秦文学史》，赵明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

都未论及。其他文学史著作更不用说。万兴同志这部对《管子》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在其文艺思想、文学性和散文的特征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我以为这无论在认识《管子》这部书，还是在认识先秦文学史、文体发展史、文学理论史上，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管子〉研究》即将出版，万兴同志要我写序，今略述确定此选题的原委，谈一些个人看法，或有未妥，与学界朋友共商。

赵逵夫

2003年10月10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管仲、《管子》与稷下学宫	16
第一节 管仲其人	16
一、管仲之出身、家世及从政之前的主要经历	17
二、初涉政坛	21
三、为相之后	22
四、管仲成功原因新探	27
五、先秦诸子对管仲的评价	40
第二节 管仲与《管子》	43
第三节 《管子》与稷下学宫	49
第二章 《管子》的作者、编辑与版本流传	54
第一节 《管子》的作者与时代	54
一、历代对《管子》作者的看法	54
二、历代对管仲遗著说的质疑	56
三、当代学者对《管子》作者的看法	59
第二节 《管子》的编辑成书	64
一、管子书在先秦的流传情况	64
二、从刘向校书看《管子》的编辑成书	65
三、《管子》版本篇目重复原因推测	68
第三节 《管子》的版本流传与研究	69
一、唐代《管子》版本及研究情况	69
二、宋代《管子》版本及研究情况	70
三、明代《管子》版本及研究情况	71
四、清代《管子》版本及研究情况	74
五、现当代《管子》研究成果	75

第三章 《管子》中的道家思想	78
第一节 《管子》的学派归属	79
第二节 《管子》对天与天道的认识	91
一、《管子》之前对天的认识	91
二、《管子》对天的认识	92
三、《管子》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	93
四、《管子》对“天道”的认识	94
第三节 道为万物之原	96
一、《管子》中道的基本特性	96
二、《管子》道的实存性	98
三、《管子》道的流变性	101
四、《管子》道的永恒性	103
第四节 《管子》中的道与德	105
第五节 《管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108
第四章 《管子》中的黄老思想	113
第一节 何谓黄老之学	114
第二节 《管子》中黄老之学的产生与渊源	116
一、黄老之学产生的思想文化渊源	116
二、黄老之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条件	127
第三节 战国秦汉以来的黄老学者与著作	139
一、战国秦汉的黄老学者	139
二、战国秦汉以来的黄老之作	144
第四节 《管子》黄老之学的主要特征	158
一、万物之源，道为根本	158
二、静因之道，因任自然	162
三、道气相通，精气成论	166
四、顺应人性，以法治国	171
五、道法结合，崇尚法治	174
六、德法并重，礼法相用	177
第五节 黄老思想对老子道家的改造与对韩非法家的影响	183

一、黄老思想对老子道家的发展与改造	183
二、黄老之学对韩非法家的影响	185
第五章 《管子》中的法家思想	188
第一节 礼法兼重，德法并举	188
第二节 道法合流，法道统一	192
第三节 法者至道，治国根本	196
第四节 置法出令，令尊于君	199
第五节 以法制断，执法必严	201
第六章 《管子》中的儒家思想	205
第一节 《管子》的民本思想	205
一、《管子》的重民、爱民思想	207
二、《管子》的富民思想	208
三、《管子》的利民思想	211
四、《管子》的惠民思想	211
第二节 礼法并举，义利兼重	212
第三节 尊贤授德，察能授官	218
第七章 《管子》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223
第一节 《管子》之前阴阳与五行学的历史考察	223
一、春秋时代的阴阳五行观念	223
二、《黄帝四经》中的阴阳五行观念	227
第二节 《管子》阴阳五行思想的主要内容	231
一、万物运动总规律	232
二、五行相生说	234
三、人与天调、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模式	238
四、《管子》中阴阳五行思想在儒道法各家思想中的 渗透	242
第三节 《管子》阴阳五行思想的地位和影响	246
第八章 《管子》中的兵家思想	253
第一节 《兵法》等相关篇章的比较	254
第二节 《管子》对战争重要性的认识	260

一、战争是治国安邦、成就霸业的重要手段	261
二、兵事者，危物也，要慎重用兵	262
三、《管子》对战争性质的认识	263
第三节 《管子》的治军思想	267
一、富国强兵的战略思想	267
二、军政一体的军民组织形式	269
三、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	271
四、选卒练士是建立具有战斗力军队的根本保证	273
五、赏罚分明，严以治军	275
第四节 作战指导思想	276
一、明于机数，用兵之大势也	276
二、遍知天下而无敌	278
三、战术上“释坚而攻虚”	280
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	282
第九章 《管子》的文艺美学思想	284
第一节 《管子》的“精气说”及其美学意义	284
第二节 《管子》的“虚静说”及其美学意义	291
一、静因之道的认知方法	292
二、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296
三、虚静说的美学意义	298
第三节 功利主义的审美观	305
第十章 《管子》的文体分类及其文学特征	313
第一节 《管子》的论说文体及其语言特点	314
一、论点明确，内容集中	316
二、多方论证，雄辩严密	318
三、巧用修辞，辞采多姿	326
第二节 《管子》中的记叙文体及其传记价值	336
一、因人成篇，记人为主	336
二、故事完整，情节生动	339
三、人物形象，生动传神	342
四、手法多样，灵活多变	346

第三节 《管子》中的经解体及其特点	350
一、前经后解的《宙合》、《心术上》	351
二、《形势解》等经解体	356
第四节 《管子》中的问答体	358
第五节 《管子》中的其他文体	361
一、格言体	362
二、著述体的《幼官》等五篇	364
三、律令体的《法禁》	365
四、纲目体的《问》篇	365
主要参考文献	367
后记	371

导 言

《管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别具特色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一部子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在战国已经广泛流传，并达到了“家有之”的程度。《管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关“法”的著作，是言“治”的重要作品。《管子》对后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汉时代的贾谊、晁错、桑弘羊等人崇奉“管子之学”，司马迁也熟读“管子书”，他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①正因为《管子》一书“其言”“详哉”，“世多有之”，所以司马迁在作传时，才略其言论，而简述其事。但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官学，《管子》学说逐渐地受到冷落，湮没不彰。其冷落的原因，明代赵用贤在《管子书序》中解释说：“夫五霸莫盛于桓公，而管仲特为之佐。自其事羞称于圣门，而其言悉见绌，以为权谋功利，学者鲜能道之。”唐代以后，《管子》重新受到一定的重视，从唐到晚清，产生了大量的研究和校勘《管子》的成果，成绩可观。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校勘与训释方面，缺乏宏观的整体研究。20世纪，产生了三大《管子》研究成果：郭沫若等人的《管子集校》

^①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6页。

可以说集历代校勘、训释之大成；罗根泽的《管子探源》对《管子》现存 76 篇进行逐一分篇考证，对其时代、作者以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开《管子》研究一条新径，成绩突出；胡家聪的《管子新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遵循郭沫若先生“《管子》书当分析成若干类集以进行研究”的思路，将分篇考证与分类研究相结合，对《管子》全书作透辟的剖析，发前人之所未发，见解新颖，独步学界。

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尽管《管子》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与其他诸子相较而言，《管子》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仍然是诸子范围中有待开拓的园地。许多疑难问题，迄今未得到理想的解决，譬如《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而《隋书·经籍志》以后的所有正史著作皆将之列入法家；还有《管子》是杂家、道法家、齐法家、稷下道家等不同说法。那么《管子》与诸子的关系究竟怎样？《管子》的学派归属究竟应该如何划分？至于《管子》的文体分类以及各种文体的具体特征，《管子》的文学成就如何等问题，古今少有论及者。这些领域都是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此外，《管子》各篇非一时一人之作，作者众多，作品时代跨度漫长，其成书情况极为复杂，在未发现新的资料和地下出土文物佐证的情况下，要考证每一篇的具体作者与时代，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无论是罗根泽先生《管子探源》的考证，抑或胡家聪先生《管子新探》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本书不采用分类、分篇考证的方法，而是将《管子》视为历代管仲学派的著作汇集，作为一部客观存在的文本进行整体研究。

《管子》一书因管仲而得名。以人名书，是先秦子书的惯例，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皆是。因此《管子》一书，韩非、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以及历代官修正史皆题为管仲所撰。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姬姓之后，是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家、改革家。他出身贫贱，曾经过商、当过兵、做过官，后来经好友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齐相。管仲生活的春秋初期，正是周室衰微、天下大乱、诸侯纷争、以强并弱的开端时期。管仲抓住这一时代契机，依托齐国东面临海的有利地理位置，辅助齐桓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振兴经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①，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管仲为政“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对外亲诸侯，攘夷狄，终于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②的大业，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他的雄才大略与赫赫业绩，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左传》、《国语》、《管子》对他的事迹皆有集中的记述，《荀子》、《韩非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说苑》等典籍对他也有不少评论。孔子对他的功绩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③

① 《史记·管晏列传》，第2132页。

② 《史记·管晏列传》，第2131页。

③ 《论语·宪问》，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

关于《管子》的作者问题，向来是《管子》研究中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管仲所著说。这种观点产生最早，晋代以前的学者基本上都持此说。韩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人以及历代的官修正史著作均持此说。这些学者与著作皆认为《管子》一书的作者是管仲本人。但这种观点目前已很少有人坚持。

（二）管仲部分所著说。这种观点首先是西晋时代的傅玄提出来的。他说：“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① 这种观点认为，《管子》中既有管仲自己的作品，也有后人的著作，皆借《管子》之名以发挥。这种观点又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管子》中哪些是管仲本人的著作？哪些是后人的著作？并没有具体的论述。如傅玄、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四库提要》等都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是管仲的著作，哪些是后人的假托。

第二，《管子》中“经言”等部分是管仲本人的著作。关锋、林聿时在其《春秋哲学史论集》中认为：“《管子》中的‘经言’各篇，以及‘外言’的‘五辅’篇，基本上是管仲的遗著（其中有后人掺入的成分）。”刘建国、张连良、乔长路等认为，《管子》中除《管子解》非管仲遗著，《短语》、《内言》、《外言》中个别段落有后人窜入文字外，其余篇章都出自管仲之手^②。李曦也认为《管子》中的“经言”部分为管仲所撰^③。

（三）非管仲所著说。持这种观点的当以朱熹为代表。他说：“《管子》非管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著书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想只是战国

① 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所引。

② 见宣兆琦、徐宇之《方兴未艾的齐文化研究》，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

③ 见《就管仲遗著问题与胡家聪先生商榷》，载《管子学刊》1988年第1期。